

建國與建軍之省思

褚漢生 將軍

提 要：

內、建國的關鍵因素在於政權統合，民國以來政權的統合，大都基於 部需求與外在壓力所致，其統合方式或訴諸武力，或訴諸和平，或兩者交相運用。

二、中山先生為了讓革命真正的成功，因舊有軍隊已不可恃，須培養澈底瞭解主義而具革命精神之軍官，故創辦 埔軍校。

三、建國與建軍之省思：(一) 歷分」與「合」只是 史過程而非目的。(二) 自立自主的國防軍備是生存發展要道。(三) 平、戰合一為「全民國防」理念的實踐。(四) 現代化國防是為因應未來戰爭之挑戰。(五) 精 武力是精兵政策的精髓。(六) 軍人武德乃戰爭致勝的泉源。

四、隨兩岸情勢發展與社經變遷影響，卻生敵我意識模糊，軍人精神教育難以落實之困境，殊深思。

關鍵詞：建國建軍、政權統合、建軍 程、精 武力、軍人武德

壹、前言

歷 民國建國進入一百週年，在這堅苦卓的革命建國 史洪流中，國民革命軍佔有極重要的 史定位。我們翻開近代史，回溯清中葉以來，中國始終陷於遭帝國主義侵略卻無招架能力的窘況。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及香港的求學過程中，親睹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以後的蓬勃生機與強盛國勢，而反觀中國，卻仍處於封建專制和不知進取的時代，以致國家主權、民族自尊及人民信心隨著不平等條約的訂定與割地、賠款的增加而一再喪失。清光緒 11 年(1885) 中法戰後，安南淪為法國之保護國，中山先生鑒於滿清顛頂無能，導致國勢積弱、政府腐敗、 廢招外侮，乃決志革命，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以拯救中國危亡〔註一〕。後 經十次革命，終在宣統年(1911) 武昌起義後，推翻滿清，創建民國。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不久，新興的國家政權淪入袁世凱手中。國父孫中山先生及革命黨人多年來為之奮鬥、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願望，化為泡影。在 1912 年至 1916 年袁世凱直接掌權的五年中，中國依然處在激烈的動盪時期，中國政局的分合變幻十分劇烈。袁世凱上台後，堅持實行專制主義，背棄民主共和制度，因而受到資階級革命力量持久不懈的反抗。清滋長起來的地方主義勢力，進入民國以後更加膨脹，其離心傾向日益明顯。袁世凱推行極權政治，採取一系列有損地方權益的中央集權政策，導致與地方勢力發生嚴重衝突，使中央政府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力，最終形成軍閥割據混戰局面，給中國社會發展造成極大的危害。

歷 山先生畢生從事建國、救國運動，在 經多次波折之後，深知中國遭受列強欺凌，即因為國家武力不足所致故要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就必須擴張軍備〔註二〕。而欲臻先進國家之林，則需結合民眾發展全民國防，並積極培養國防人才，務實從事國防建設，同時注重軍人精神教育，使國防具備現代化之條件。今天從 史的角度 探討建國與建軍，是希望藉由 史，思考現在、掌握未來、開創新局。從 史角度而言，革命開國初期，因 革命基本武力，致遭反革命武力之打擊，屢次頓挫。自 埔建軍後，其武力成長進程，乃由無到有、由少變多、由劣勢轉優勢，所以革命戰爭之初期，必須致力於創建並擴展革命武力，以求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始能完成北伐、抗戰兩大革命任務。然而抗戰勝利，其實我們是慘勝，百廢待舉，民心思變，大家都想過一個安適的說子。就整個大戰略來 ，我們沒有營造一個有利的戰略態勢，中共乘抗戰坐大，同時拉攏了蘇聯，離開了國民黨與美國之間的關係，致使美國漸次的對國民黨政府失去信心，同時國 金融政策的失敗導致經濟也隨之瓦解，這也驗證了大戰略與國家安全戰略失敗，即使野戰戰略成功，也無法挽回不利的戰略態勢，更何況一連串的野戰戰略失敗，讓國軍退守到臺灣。這些慘痛的戰爭代價，我們必須擷取經驗教訓，落實國防建軍工作，冀望國軍能承先後、繼往開來，永續發展。

貳、建國的關鍵因素－政權統合

一個國家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要素，包含文治與武備。文治為立國之根本，武備乃強國之要件。僅有文治而無武備的國家，易遭外敵入侵；反之政府效能不佳，單憑武力維持政權的國家，雖然或許能稱霸一時，但也無法維持長久。民國以來政權的統合，大都基於 部需求與外在壓力所致，其統合方式或訴諸武力，或訴諸和平，或兩者交相運用。在肇慶護國軍軍務院成立之前，中國境 雖然沒有兩個對立政府，但在這六年中仍有戰爭。

1913 年 7 至 9 月，袁世凱以武力方式剷除對其權力威脅的國民黨勢力，創民國建立後以武力統合的先例。惟 武力政策，不但逼起國 反抗，也造成 部的分裂，甚至造成外國勢力的入侵。前者有孫中山中華革命黨和 護國軍的倒袁，後者有袁軍 部(瑞)、馮(國璋)的不合作，同時更引起日本 21 條要求的壓迫。

袁卒後，繼掌北京政權的皖段仍迷信武力政策，曾先後兩次出兵湖南及四川。同樣情形，段氏的武力政策非僅 起西南各省軍人的反抗，其在北京政府 部也造成直皖分裂1920 年直皖戰爭後，皖段勢力趨於沒落。繼由 系替代皖段操持北京政局，該系將領 佩孚再度實行武力政策，一方面壓迫孫中山的廣州革命政府，同時壓 北方奉、皖等系勢力，致有兩次的直奉戰爭。但其結果不僅造成反直各派的聯合反抗，且亦引起其 部分裂發生一連串的混戰。南方革命軍乃乘勢北伐，直系瓦解，國民政府完成南北統一。

國民政府完成北伐，結束了民國以來軍閥割據的局面，達成中國形式上的統一。但國民黨 部亦有紛爭與分裂致黨權旁落，使軍權膨脹與分割。例如北伐期間即有寧漢分裂，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雖以引退方式達成寧漢和 兩 合；旋不幸有李宗仁、唐生智等之 戰，開國民黨北伐時 部火拼之惡例。北伐後的中國，大致形成南京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瀋陽等六個軍權中心〔註三〕。除南京為中央政府所在地由蔣中正主控外，其餘各中心分別由李濟琛、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和張學良分治之，形成中央與地方軍權分割的局面。國民政府在北伐後，藉訓政以集權中央，仍以武力方式謀求整合，1929 年南京中央曾先後對武漢桂系李宗仁及西北馮玉祥用兵，雙方各恃武力相向，形成所謂「地方以武力對中央，中央亦以武力對地方」〔註四〕，尤以 1930 年的「中原大戰」為烈。南京中央雖在軍事上取得勝利，並不能促成政治上的整合，反而導致其 部的分裂。由於蔣中正與胡漢民的決裂，造成寧的對抗，使部分參與中原大戰與北平擴大會議的反蔣各派，再度結合起來， 成立廣州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這兩年來國民黨 部的戰爭和分裂，不僅使中共勢力坐大，且也招致一連串的外患，先後有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對於後者竟無抵抗而喪失廣大國土，致使國民黨聲譽大受損傷〔註五〕。「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政府整合分裂政權的策略顯有改變，除對改變國號的江西中共和閩變的分裂政權，仍取武力討伐的方式外，餘多採用和平的方式。例如對於寧分裂的處理，則於 1931 年 10 月

間在上海召開和平會議並達成協議：蔣中正宣布引退，南京國民政府改組，廣州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則宣告撤銷。雖然廣州仍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名義維持其半獨立態，但寧上海和平會議，實已樹立國府以和平方式謀求整合的良例。爾後對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四川劉湘的高度自主性，南京中央軍充分表現相當容忍與和平了結的態度，有別於「九一八」事變以前的武力征伐政策。

至於國共之間的整合，自1930年至1934年10月，南京中央政府對於中共的蘇維埃政權，曾先後進行五次軍事圍剿及追剿(1935-1936)內動。中共繼以暴力來企圖推翻國民政府，國府則藉「安撫外」政策以謀統一。其後中共策略有所轉變，由「抗日反蔣」而變為「逼(聯)蔣抗日」，雙方乃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但國府的追剿政策，卻也造成國民黨部的分歧，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李宗仁、劉湘等都會有聯共反蔣的舉動；1936年的「西安事變」，不僅使「安撫外」政策受到直接的挑戰，也使武力剿共為之停止，並加速了國共雙方的和解。其和平解決的主要原因，還是日本軍閥加緊對中國侵略的壓力，國人迫切要求對日抗戰，1937年2月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確定對中共和平政策。經過七個多月的和談，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目標直到抗戰勝利後，國共始再度決裂。

參、國民革命軍建軍歷程

中山先生在北伐宣言中感慨的提到：「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辛亥革命，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滿州征服階級，.....〔註六〕」惜革命成果並未堅守，以致「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佩孚之竊位盜國。〔註七〕」在革命烈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所建立的中華民國，在13年之後，仍處於軍閥割據的局面，中山先生認為：「現在得到的結果，祇有民國之年號，沒說民國之事實，簡單的，就是由於我們革命，祇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註八〕」

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讓我們深刻瞭解北洋軍閥只是為個人權位，而非為了國家長遠的利益。為了讓革命真正的成功，他深知舊有軍隊已不可依恃，想要革命事業之發展，非創造真正之黨軍，而創造黨軍之基礎，須先培養一批澈底瞭解主義而具革命精神之軍官〔註九〕。遂決心創設軍官學校，並於民國13年5月3日，任命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註十〕，同年6月16日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中山先生在黃埔軍校成立致詞時強調爾後要以這個學校的學生做基本，成立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註十一〕。而我國真正的統一，就是源自黃埔建軍後才完成。以下僅就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時期、安撫外時期、對日作戰時期、戡亂時期及復興護地整軍備戰時期分別論述，並依史事變遷將各時期之任務目標、建軍概況做一簡單說明。

一、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時期

(一) 任務目標：掃蕩革命障礙—軍閥及打倒帝國主義，統一全國。

(二) 建軍概況

黃埔期軍隊編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黃埔建校時的黨軍時期，國民革命軍的基礎為黃埔軍校所培養出來的黨軍一脈，而黨軍實即以軍校師生為基本的教導團所組成。初設教導團一、二團，教導團之編制與訓練係參酌蘇俄新制(每團每營、營三連、連三排)各級部隊亦分設黨代表，一團兵506人，包含特種部隊則在1,500~1,800人之間〔註十二〕，此制與清末以來的軍隊編制完全不同〔註十三〕。第二階段則為民國14年7月1日，大本營改組為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以掌理全國軍務。7月26日為統一軍隊稱號，取「國民革命」之義，定名為「國民革命軍」，以表明是「國民黨召集優秀國民所組織之軍隊，是以革命為宗旨」〔註十四〕。當時國民政府所轄軍隊改編後有五個軍，第一軍即是黃埔軍校教導團改編而成，蔣中正任軍長；湘軍改為第二軍，譚延闓任軍長；滇軍改為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軍改為第四軍，李濟任軍長。9月，福軍改為第五軍，李福林任軍長〔註十五〕。

國民革命軍成立之後，在主義、思想、信仰及精神教育的領導下，以寡擊眾，勢如破竹，15年2月完成兩次東征；同年7月誓師北伐，至17年底東北易幟，短短兩年時間全國統一。黃埔軍校的成立具有幾項重要意義：1.這是中山先生面對民國以來軍閥禍國所採取的最根本措施，也是中國國民黨自建武力的開始。2.軍校設立黨代表，接受黨的控制，並實施政治教育。3.外籍顧問的聘任，從國民革命軍建軍之初即開始聘任蘇俄顧問，北伐期間改聘德國顧問〔註十六〕。

丙、安撫外時期

(一) 任務目標：安撫外內求統一，外抗日本。

(二) 建軍概況

此時期建軍重點置於國軍之整編。全國統一之後，全國軍隊計有84個軍，約300個師，兵額數量高達220萬人以上，這是北洋時期1至3倍、清代的4倍之多〔註十七〕。軍隊員額龐大，致使養兵費用高，且過去軍隊皆為私人之武力，欲使軍隊成為真正之國軍，國軍整編刻不容緩。然而國軍各派系為保存實力，引發中原大戰〔註十八〕。

中原大戰後，國軍採德國軍事顧問之建議，預計全國陸軍逐年整編訓練為60個師〔註十九〕，至抗戰初期僅完成40個師之整編(約30萬人)，其餘大部分之部隊仍未整編，缺乏現代化之裝備與訓練〔註二十〕。當時整軍原則為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團以下單位力求健全，加強特種兵，經費不增加，人事法規一律依法規辦理。在海軍方面，我國現代海軍的建立始於清末。國民政府成立後隨即對海軍進行整編，並於18年6月設立海軍部，下轄有第一、第二艦隊、練習艦隊、魚雷游擊隊、測量隊、巡防隊，海軍在陳紹寬的規劃下，亦積極的自製或向外國購買若干新艦〔註二一〕。在空軍方面，民初中山先生就已經有航空救國的理念，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在德國顧問的建議及協助下，於民國17年在杭州設航空班，20年改為中央航空學校，25年於南昌成立中國航空機械學校，軍事委員會亦設有航空委員會主管空軍發展事宜。另外在軍事學校的設立、兵工製造業的建設等方面也有相當的成績〔註二二〕。

三、對日作戰時期

(一) 任務目標：抵禦外侮，贏得對日作戰勝利。

(二) 建軍概況

民國26年全面抗日戰爭展開後，全國由平時進入戰時態。政府為動員全國人力、物力，支持長期抗戰，即於八月起擴大軍事委員會編組，設有1至6部，分掌軍令、政略、國防工業、國防經濟、國際宣傳及民眾組訓

事宜。後隨戰局的發展與需要，時有修正〔註二三〕。抗戰期間，為維持戰力、長期抗戰，各戰區依據所頒軍師編制表整理方案，一面作戰，一面繼續整理補充。民國30年初，美國國會通過對我租借法案。同年11月，美國派遣軍事援華顧問團協助我訓練並接受美援裝備換裝，惟當時交通困難，運輸工具缺乏，運達中國租借物資仍不敷抗戰所需。民國34年1月，中印公路通車，租借物資始大量湧進，國軍新編裝得以迅速進行〔註二四〕。不過，國軍因應抗戰需要，軍隊不斷擴充，總計抗戰時期全國兵力高峰曾達120個軍，354個師，然雖於抗戰後期政府進行軍隊之縮編，迄34年底全國兵力縮減為89個軍、2個騎兵軍、及253個兵師，官兵人數仍高達100餘萬人〔註二五〕。抗戰期間，國軍以極端劣勢之處境抵抗日軍之攻勢，前後一經年，動員1,400萬人，傷亡官兵320萬人(不包含一般人民之生命財)〔註二六〕，一經會戰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戰鬥38,931次〔註二七〕，終於獲得勝利，勝利之代價實相當巨大。

四、戡亂時期

(一) 任務目標：戡亂。

(二) 建軍概況

抗戰時期的國防組織，為因應戰爭需要，不斷增設機構，因而造成組織龐大、系統複雜、事權割裂、彼此牽制的情況。而軍政與軍令分立，海、空軍自成系統，彼此不能協調，影響尤大。另軍事委員會超出五院之外，獨立行使職權，亦不符戰後憲政體制之運作。國民政府在考量軍事委員會階段性任務已完成及當時國情需要後，即著手研擬調整國防體制，並於民國35年5月31日撤銷軍事委員會，6月1日於行政院成立國防部，統籌國防事務〔註二八〕。同時，為解決戰後龐大的兵員問題，國民政府遂積極規劃整軍及復員方案，並邀集中共就整軍問題進行談判，預定平時維持20個軍、60個師的兵力。不過，中共並未真心配合，並假談判之名，爭取喘息及壯大機會。當共軍目的得逞，即破壞協定，戰事於是再起，政府整軍方案亦遭延宕。

中共的發展，自始受到蘇俄的支持。蘇後於民國34年8月8日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並獲悉日本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後，即於翌(9)日對日宣戰，並派兵進入東北。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使蘇俄得以順利接收日軍在東北之軍用物資，同時並扶植中共在東北發展勢力〔註二九〕。中共在東北獲得裝備、物資後，旋即全面進行叛亂，政府不得已於民國36年7月4日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方案」，進行戡亂作戰〔註三十〕。

戡亂作戰初期，國軍進展頗為順利，不過國民政府對戰後所造成經濟的蕭條、通貨膨脹，以及中共控制農村，掌握了廣大兵員等問題，一直無法有效控制與解決。當時國軍雖仍有200萬以上之兵力，且大部分為美式裝備，但中共藉與蘇俄簽訂之「哈爾濱協定」，源源不獲得武器裝備，及國民政府處理偽軍及復員之不當，復加上失意政客及軍人之操弄，戡亂戰局逐漸逆轉，終至失敗〔註三一〕。

五、復興基地整軍備戰時期

(一) 任務目標：從「反攻大陸」到「有效嚇阻、防衛固守」。

(二) 建軍概況

民國38年底，國軍在大陸戰場失利，轉進臺灣。當時共軍隨時有渡海攻台的可能，台海情勢險惡。39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一方面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另一方面也宣布將給予中華民國選擇性的軍事援助，以加強抵抗任何武裝之攻擊〔註三二〕。時任聯軍統帥的麥克阿瑟將軍於同年8月派遣福克斯將軍(Gen. I. J. Fox)率領軍事調團來臺，對我國三軍裝備戰力實施評估，並於10月向華府提出援華建議案〔註三三〕。爾後，隨著中共參與韓戰，加強了美國協助防衛臺灣的決心〔註三四〕。

民國40年，美國國務院同意在臺灣設立美軍顧問團〔註三五〕，經過美國務院及國防部達成協議後，首任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將軍於5月1日底來台履新〔註三六〕。美軍軍事顧問團三項主要任務：1. 備我政府諮詢。2. 協助訓練軍隊及使用新武器。3. 配備軍援器材〔註三七〕。民國68年，美國與中共建交，我與美斷交，美軍顧問團始撤離。

從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至中美斷交的30年期間，在國軍務實的檢討過去失敗原因及配合美援的協助與適時採納美軍顧問團的建議下，積極實施精簡整編、裁撤許多部隊番號與冗員，並改編組織、更新裝備、加強訓練，逐漸奠定今日三軍形態的基礎；而在精神、制度、紀律、組織及官兵生活方面也都有顯著的提升。政府一面透過美援改善國軍現況，一面也謀求國防上的自立自主，如民國52年即開始擬定「國防科學人才長期培養籌備方案」，並籌備中山科學研究院，依據建軍需求從事現代化國防科技武器之研究，在火箭、飛彈、飛機、戰鬥車輛以及艦船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

隨著國際局勢及兩岸情勢的轉變，我國國防政策也逐一修正，從「反攻大陸」一經「攻守一體」、「守勢防衛」、「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轉變到目前的「有效嚇阻、防衛固守」〔註三八〕。同時，國防科技的進，使得二次大戰以來的傳統戰爭也轉變以科技、資訊為導向的戰爭。國軍為因應變局，從民國39年以來即持續精簡，民國45年以前先後進行4次大幅度之整編，之後，復有前瞻、輕裝師之整編，以及陸精、崑崙等案之進行。近年則以民國86年7月1日起推動之「經實案」精簡幅度最大，國軍員額由45萬餘員降為38萬餘員，並依計畫調整兵力結構，陸軍以聯兵旅為主體，海、空軍則在新一代艦艇(康定級、成功級、濟陽級、錦江級)及戰機(F-16、IDF、幻象2000-5)獲得後整編完成〔註三九〕。民國89年1月29日亦制訂公布「國防法」及「國防部組織法」，更確立了「全民國防」、「軍政、軍令一元化」及「軍隊國家化」的原則〔註四十〕。目前，國軍持續進行「精進案」，預計民國100年兵力目標降至30萬人，並建立一支快速反應遠距精準機動打擊的現代化國防武力〔註四一〕。

肆、建國與建軍之省思

歷、「分」與「合」只是 史過程，而非目的

從歷 的過程看，分分合合是一個 史事實，我們讀 史的不能否定它的存在。秦始皇、隋文帝、宋太祖都是 鑄鐵每個分的局面。從 史紀 我們可以發現， 一次在分裂很長一段時間後又會再合，這個「合」的因素不是武力！秦始皇統一東方六國，沒有經過很不得了的血腥大戰，戰國時代的大戰都不在秦王政在位的時代，秦王政滅東方六國沒有經過大的慘烈戰爭。隋文帝的平陳與宋太祖的平定十國，也都沒有經過很慘烈的戰爭。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這些分了很久以後的「合」是民心先已經合，戰爭只是一個演戲的過程而已。所以真正的

「合」，不是靠戰爭，而是靠老百姓心理上的合。所以，任何一個「分」的局面下，要想合起來，老百姓在這對立的兩邊或者三邊之間，心理的合是很重要的，彼此之間的敵對亦要減到最低，雖然兩個政權的當政者還在對立，但是當政者到底是所有人民裡的極少數，所以政治人物可能對立，老百姓不對立，這種合，才是基礎很穩固的合，這是 史給我們的教訓。

檢討民國以來政權的統合，不外使用武力與和平兩種方式。但此兩種方式，有的成功，有的失敗。就和平方式而言，在北京政府統治期間，1916年肇慶護國軍軍務院的結束，即用和平方式，而在1919年上海南北和平會議則為成功。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用和平方式統合成功者較多，有1928年底之東北易幟，有1931年10月上海之寧和議，有1936年10月和平解決兩廣事件，有1937年上半年之國共談判。但1946年之國共政治協商與軍事調處則未成功，終於演變成更激烈的戰爭。就武力方式而言，無論北京政府或國民政府時期，對於廢裂政權大多藉用武力統合。從 史經驗來看，訴諸武力方式的統合，無論成功於否，均難達到真正的完全統一，以袁世凱的武力統一為例，其統合不久，分裂再起，爭戰規模更大，北伐後的國民政府亦然。即使達成形式上的統一，也難以維持長久。而武力政策最顯著的弊端，不僅造成長期的戰亂和分裂，也經常引起外患的入侵，形成戰亂、分裂的惡性循環。

我觀歷國人常 「鑑古知今」，西洋人也有「如不知過去，將失去未來」的 法，從上述我們可以瞭解， 史上的「分」與「合」只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怎麼樣使我們生活更好，這是最重要的。歷史上許多戰爭，實際上對是少數的執政者，為了爭取某些集團或者某些個人的利益而發起戰爭，戰爭的結果，□ 大多數的老百姓是犧牲者。台海兩岸的人都生活在地球村裡面，在兩岸隔離近一甲子，期盼兩岸有一個非常安定的環境，讓我們能從事經濟建設與科技研發，提升我們人民的生活水準，冀望兩岸的領導者能繼續向這 繼續向走，帶領我們中華民族 離貧苦，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分」與「合」的問題，由 史智慧去抉擇。

二、自主自主的國防軍備是生存發展的要道

說山先生在其「實業計畫」自序：「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註四二〕」在國防計畫錄說函中亦列有「國防與國權」，他對於「權」的作用，曾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有所 明：「權就是力量，就 越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權的作用，簡單的，就是要用來維持人類的生存。〔註四三〕」故中山先生所積極籌建的軍備力量，就是一支有獨立自主能力的軍隊，以保衛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如落實到軍事層面，則中山先生國防思想中的另一幅藍圖為自主性之國防，殆無庸置疑。

國防軍備以國防自主為核心舉世皆然，也是國軍建軍以來一直秉持的理念。建軍初期，國軍秉持中山先生理想，建立國民革命軍為掃除國民革命障礙而努力。全國統一後，我國防軍備能量逐漸充實，然接踵而來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及中共叛亂，卻使我國防工業建設停頓不前，國防軍備研究能量亦無法積累。及至政府遷台後，國軍雖接受美國援助，然對國防自主的努力卻也從不放棄，並在自立自強的信念下，設立了中山科學研究院等相關機構，從事國防武器系統、裝備研究發展以支援作戰。後中美斷交，亦研訂「國防科技發展方案」及成立相關科技推展機構如「國防科技發展推行委員會」等，積極建立自主國防科技業與研發體系，為國軍新一代兵力整建立下汗馬功勞。近年則更積極擴大與、官、學、研各界合作，厚植國防科技工業能量於民間，朝「國防自主、全民國防、科技建軍、自製優先」的目標前進〔註四四〕。

國防自主，雖是世界各國追求的理想與目標，也是一國國力的綜合表現。不過，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由於國家財力、科研及工業能力、技術水準等條件限制，加以世界各國為求權力平衡、預防戰爭，對軍備發展與管制亦訂有嚴格的規範〔註四五〕，因此世界上除美、蘇、法之外，真正擁有國防軍備完全自主能力的國家幾乎沒有，多數為自行研發、合作生及外購等並行，只是比例不同而已。我國亦不例外，國軍現階段雖僅具備國防科技部分自主能力，惟整體仍須仰賴軍購與外購。不過；就長期而言，降低外購、提升自主仍然是我們必須要努力的目標。加以國際環境和兩岸局勢，都是軍備須朝自立自主方向發展的重要考量。國家安全不能冀望他國援助或敵人憐憫，唯有自立自強，才是生存之道。

三、平、戰合一為「全民國防」理念的實踐

中山先生手著之「實業計畫」，雖為國家之整體建設計畫，就國防層面深思，實乃一重大之國防建設計畫。他深知富強之本，在於開發實業，繁榮經濟，並奠立堅固的國防基礎。故其國防計畫書之綱目中，舉凡國防與實業計畫之關係、發展國防工業、農業、礦業、商業、交通、教育等計畫、都市與村之國防計畫、移民東三省、新疆、西藏、 外蒙古各邊疆省計畫等，均與實業計畫有關。其整體重心，則在強調國防與民生合一，即「平戰結合」、「經濟與軍事兼顧」等「全民國防」理念的實踐。

我國現階段全民國防理念，與中山先生所著眼的國防與民生合一，可 相去不遠。檢視現代全民國防運用最著名之案例，則以1982年4月2日英阿福克蘭群島之役最為著稱。當阿根廷軍隊入侵英國屬地福克蘭群島之後，英國政府面對日益精簡的有限兵力及遠在8,000哩外之戰場，如何投射兵力及前運物資實傷透腦筋。不過，4月4日就在其朝野共識下，迅速通過名為「協力作戰」(Operation Corporate)的方案，取得對民用船艦、物資進行 廝周)的法源，同時，並在短時間 獲得民眾的認同與社會的支持，使英國得以在福克蘭群島實施兩棲作戰並獲得最後勝利，英軍此戰役之成功，「協力作戰」計畫實居功厥偉〔註四六〕。及至後冷戰世界各國裁減軍備之際，平戰合一、全民國防等思潮已然蔚為風氣，並逐漸顯現其重要性。

全民國防的意涵，在於國防需要獲得全體國民的支持，才能發揮整體戰力，達到保障國家安全的目的。我全民國防之施政方針，即在有效運用全國人力、物力、財力，以憲政建設為基礎、以軍事建設為核心、以經濟建設為後盾、以心理建設為動力，支持防衛作戰整備，強化全民國防力量。為達成上述目標，國防部以「國家總動員法」及「防空法」等為法源依據，推動全民國防動員機制；繼而研訂「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於民國90年11月14日完成立法並公布施行。至此，我國全民防衛動員終於較有明確之行政動員與軍事動員體系，使平時充分積儲總體國力準備，面對戰爭或緊急危難時，亦能迅速轉換並充分運用、適時支援，成為平、戰合一的全民國防安全機制，以確保國家安全〔註四七〕。

不過，目前雖有「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之法律基礎，然如何讓全國民眾瞭解本法的精神、作法，以及配套之相關法令研訂，還有極大的努力空間〔註四八〕。根據國防部委託對「全民國防理念之認知」調報告中顯示，大部分的民眾對全民國防的訊息是來自高中以上學校的軍訓課以及服役時所獲知〔註四九〕，這對廣泛傳達全民國防的概念，以及建立民眾對全民國防的支持是非常不的，政府應該更積極精心規劃與強力宣導，使人民正

確認知全民防衛動員的機制與精神，並願意全力配合。否則，一旦戰事發生，以現代化戰爭時間短、決戰快的特質，未能即時掌握人力、物力、財力運用之金時期，極可能造成戰事不利及失敗的情境。

四、現代化國防為因應未來戰爭之挑戰

西方工業化、現代化的科技成果，成就了列強的船堅砲利，甚至世界性的軍事革命。中山先生目睹西方列強的鎗砲，及凜於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豐碩成果，指出中國的強盛除必須置重點於國防科技的研發，其中首重鍊法西方科技，即古所謂「唯楚有材，唯晉用之」。在國防計畫目錄的綱目中，詳列了諸多作法，如兵器之改良計畫、派遣青年軍校學生留學歐美、向列強訂製各項海陸空新式兵器、購買各國軍事書籍、軍用品、科學儀器、聘請列強軍事專家人員來華教練等。過去，我國在致力國防建設的過程中，大致也依循中山先生師夷長技的作法。

國防現代化不應僅僅是著重硬體—船堅砲利，更重要的是配套的軟體—從事戰鬥的軍人素質和組織文化。所謂軍人素質，亦即其是否具備因應現在及未來環境變動的能力及對知識的有效運用，換言之，未來戰爭成敗，將繫於軍人是否具有肆應知識導向戰爭及資訊控制戰爭的能力，並能發揮知識經濟之效能，期透過國防智能之出，減緩實質之國防人力、經費支出。這也是中山先生不斷強調及提醒國人須自行研發科技、訓練人才及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等道理之所在。現代資訊技術發達所造成戰爭形態的改變，已導致未來戰爭，將不僅僅只發生在戰場之上，也模糊了前後方的界線。因此，如何培訓高素質的國軍人力，以因應戰爭形態的轉變，實刻不容緩。再者，組織文化的改良亦是重要的一環。19世紀初期，日本軍事組織、文化和能力仍仰賴武士使用刀劍和弓箭，德川家康幕府時代所採行的鎖國政策，導致日本根本無能力建立屬於現代化的國防組織與架構。然而，19世紀末至20世紀所進行的明治維新運動，不但建立了一支以普魯士為模仿藍本的陸軍和以英國為師的海軍，並在1894年、1904年分別擊敗只求船堅砲利的中國及故自封的俄國，一躍而成為亞洲強國。究其成功關鍵，首為主事者將西方法政制度的精髓植基於日本的改造，同時迎合科技的發展(船隻動力由蒸汽動力取代風帆)，並由一群赴歐洲學習西洋法政和科學的人士發起及重塑軍事組織〔註五十一〕。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榮景，令中山先生慨然，因而亟欲建立現代化之軍隊。

我國建國以來，亂與外患頻仍，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各次軍事事務革新一一錯過〔註五一〕。但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此新一波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軍事事務革命，經過兩次波灣戰爭的戰場驗證，已讓世人瞭解，若不能掌握此次變革，必然輸掉下一場戰爭。國軍已掌握此次軍事事務革新核心，正積極的求新求變革。不過，鑒於清末自強運動以來，我國在軍務革新方面，總以形而下之裝備為上，忽略固本之核心應是政治、社會、經濟、教育及國民心理之全面革新。現時國軍正兵力整建之際，尤應記取清季自強運動失敗之鑑，並以更積極的態度汲取新知、即時掌握全球軍事脈動及培養更多優秀的國防人才，才能因應未來戰爭的挑戰。

銳、精—武力是精兵政策的精髓

中山先生在國防計畫書綱目中，很明確的列舉「實施全國精兵政策」一項。兵貴在精不在多，這是中國軍事家自古以來一貫的共識。然而，自清季以來世界列強不斷的侵擾，加上民國成立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對我欺凌，致使我國在動盪不安的況下，仍維持了龐大而積弱的軍隊。抗戰勝利後，政府雖對戰時擴張的軍隊進行復員與裁撤，然而，方法、手段不佳及配套不足，加以中共假改革之名行叛亂之實，以致政府縮減軍隊員額的方案遲遲無法有效落實，最後以退守臺灣收場。

政府遷台之後，依據戰略之調整，縮減員額，精兵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國軍人數從來台之初的80萬人，逐年遞減至現在的20餘萬人。另外，在國防預算方面，也從政府遷台之初佔國民生毛額(GNP)的9-11%〔註五二〕降至目前的2.61%〔註五三〕，現更配合大陸政策以及國防需要與變革，持續進行之中。

國軍檢討所縮減的員額，除輔導就業、就學、就養、就醫之外，更在行政院成立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協助、輔導退除役官兵參與政府重大公共建設及偏遠地區的開發，如參與民國60年代的十大建設等，均對臺灣建設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凡此舉措，一方面以平和的手段讓退除役官兵生活有所依託，同時亦建設了國家及促進了社會繁榮；而國防預算額度的縮減，也讓政府擁有更多資源從事經濟建設及改善社會福利措施。國防人力及國防資源的釋出，恰也符合了中山先生所言精兵政策中之運用所裁減的兵額去開發邊疆及發展實業的原意。

國防建軍的目的首在保障國家安全。我國目前在中共的武力威脅下，必須負擔較重的軍費，但國家仍須兼顧文教、經濟與社會福利等建設，尤其，在當前軍事事務革新不講求數量而強調網—化作戰概念下〔註五四〕，我國國防建軍的理念，應朝向建立嚇阻而非對等的力量，亦即我們不與敵人在量方面競賽，而是要建立一個高素質、銳科技的精—武力，足以使敵人付出他所不能負擔的損失。故在「量少、質精、戰力強」的建軍指導下，應當戮為積極規劃及改良現行兵制，如朝向以募兵為主、兵為輔的兵役制度，都是的討論的課題〔註五五〕。讓軍人成為一門專門的事業，同時也是一支具有強大防衛能力的武力，是精兵政策之精髓，也是刻不容緩之事。

六、軍人武德乃戰爭致勝的泉源

孫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降至中山先生，則在勗勉軍人精神教育之重要，他強調精神教育為「即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叟弗離，雖至造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為軍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反是則否。〔註五六〕」

歷中山先生所謂軍人精神之三要素，即是發揮智、仁、勇的力量，以救國救民。綜觀國軍—次戰役，中心思想對國軍的影響是相當重要。如北伐時期，國軍以有組織、有系統之精良勁旅，如出柙猛虎，使盤據各地之軍閥戴兵游勇一時望風披靡，黎民百姓「食壺漿，以迎王師」。抗戰時期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對日展開堅苦抗戰，在全民為後盾的支持下，贏得最後勝利。戡亂戰役，國軍以優勢的裝備及軍隊，卻在極短的時間—全面潰敗，固有複雜的政經因素，純就軍事言，軍人氣節之喪失，厥為主因。政府播遷來台後，痛定思痛，首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立軍官訓練團，多次召集國軍重要幹部針對國軍失敗之原因及雪恥復仇之急務進行檢討與研習〔註五七〕，強調並深化國軍將士對氣節的涵養，以及軍人精神教育的提倡〔註五八〕，並長期進行莒光日教學，藉以強化官兵精神武裝教育、無形戰力。並訂定國軍教戰總則對智、信、仁、勇、嚴之軍人武德詳加詮釋，並多所勉勵、時時體會，以堅定軍人氣節，為國奮鬥。

今天，隨著兩岸情勢的推展，國軍除賡續軍人武德及精神教育之外，愛國教育的深化，已更顯急切。中山先生的時代並無國家認同的問題，而今國家、社會在政客的操弄下，卻生極嚴重的國家認同混淆與社會價錯亂的現象。此敵我界線模糊、國家意識日薄之際，國軍為堅定立場與使命，已確立「以憲法為根基，以民意為依據」、

步為何為戰—為中華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為誰而戰—為中華民國百姓安全福祉而戰」的中心信念，進一鞏固中心思想〔註五九〕。證諸近年來的兩次波灣戰爭，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先後兩度擊敗伊拉克部隊，除了聯軍的裝備、訓練精良外，其關鍵莫過於伊拉克軍隊缺乏中心思想所致。伊軍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以致敗仗連連屈辱景象，在日，實足殷鑑。

綜觀各階段建軍 程，對日抗戰勝利以前，我國國防軍備、國防現代化及精兵政策之 況並不理想，不過在全民國防及軍人精神教育方面，卻顯現出全民皆兵和高昂的士氣。反觀抗戰勝利後，國軍對共軍之戡亂，挾優勢之國防軍備和兵力，卻慘遭失敗，究其原因，則軍人氣節及精神之喪失則為主因。及至目前國軍武器裝備已臻現代化之水準，惟隨兩岸情勢發展與社經變遷影響，卻生敵我意識模糊、軍人精神教育難以落實之困境，殊深思。

伍、結語

中國自清末以來，因國勢日弱，屢遭強權欺凌，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後，深切體認國防之重要，遂謀富國強兵之計，救中國於存亡之秋，並為我國防建軍奠下基礎。其後，我國軍 經各階段之建軍時期，亦先後參與北伐、剿匪、抗日、戡亂等諸戰役。然而戰爭最終目標是追求國家現代化，但國家現代化要以「和平」為基礎。中共最近一再倡言「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對外強調「和平」，卻又不放棄武力犯台；因而我們應思考的是如何解決台海爭議，而不是以漠不關心的態度，坐令兩岸優勢逐漸喪失。我們應站在戰略制高點上思考問題，同時要專注國防建軍，沒有實力，如何贏得大陸人民對我們的尊敬？無論從任何戰爭的角度去解讀，都應慮 史與現況相結合，否則後果堪慮！

綜觀國軍建軍，隨著時代演進均曾屢求改革，惜以國家情勢大多處於不穩定的 態，不僅無法獲得大幅有效的成果，有時反陷國家於危亡。政府遷台之初，共軍仍時以武力侵擾，及至八二三砲戰後才充分扼制共軍氣焰，情勢轉為穩定，使國軍得以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先則改善部隊組織編裝、修訂準則，繼而籌建新一代兵力，以迄近年之精實案、精進案等，莫不均以建立一支精實優質之軍隊自許，並已取得具體成效，雖與世界先進國家仍有相當差距，如與中山先生當初理想相較，則為實踐奉行、與時 進。

在中華民國邁入建國一百週年之際，我們所面對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兩岸之間關係的調整。 史上的分與合只是一個過程而非目的，我們應從「 史的／人民的立場」出發，思考並安排這個問題，將這個問題置於中華民國（臺灣）歷 具體脈絡中加以考量，拓展 史思維的廣度與 史意識的深度，在時間的變遷中尊重「人民的意願」，跳 「統／獨立」的二分格局，在時間的變遷中，掌握解決問題的契機。然而，當前最重要的就是百年建國與建軍之檢討，百年來國軍建軍隨國家發展脈動起伏不定，然就今日國軍建軍趨勢與中山先生之國防思想相較，在國際情勢及國防科技發展快速的今日，反更能體會中山先生國防思想之宏觀與前瞻。此國軍再次轉 階段，實應記取 年變遷經驗與教訓，盱衡時勢，採行更為開闊與有深度的建軍作為，才能真正適應未來國家之變局，並在全民國防的共識下，朝野上下同心合力謀求國防制度、組織變革，確實掌握這波以資訊技術為主的軍事事務革新，使國軍成為真正的現代勁旅。

註一：羅家倫，《國父年譜初稿》，上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47 年 10 月），頁 32。

註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軍人之本分〉（民國元年 4 月 26 日）錄收 於《國父全集》，第 2 冊，頁 227。

註三：蔣永敬，〈國民黨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載自著《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82 年 5 月），頁 174-175。

註四：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頁 591。

註五：蔣永敬，〈國民黨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頁 196-197。

註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民國 13 年 9 月 18 日）錄收 於《國父全集》，第 1 冊，頁 915。

註七：同註六。

註八：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民國 13 年 6 月 16 日）錄收 於《國父全集》，第 2 冊（台北，編者自印，民國 62 年 6 月），頁 691-700。

註九：黃呂芳上，〈先總統蔣公與 埔軍校的創見〉，收 於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 埔軍校六〇週年論文集》，上冊（台北，編者自印，民國 73 年 6 月），頁 26-28。

註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民國 13 年 5 月 3 日），收 錄於《國父全集》，第 4 冊（台北，編者自印，民國 62 年 6 月），頁 1129。

註十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北上宣言〉（民國 13 年 11 月 11 日）錄收 於《國父全集》第 1 冊（台北，編者自印，民國 62 年 6 月），頁 921。

註十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埔軍官學校校史簡編》，（台北，編者自印，民國 75 年 1 月），頁 17-19。

註十三：甲午戰後，清廷認為日本之所以勝利，是仿西法所致，因此亦仿西法改革及編練軍隊，號稱定武軍，亦即後來慣稱的「新軍」，後袁世凱據以擴充為新建陸軍。定武軍從編制到訓練方法，都仿德國的辦法，初設步營，計有 兵，000 人、炮隊 1,000 人，馬隊 250 人、工程隊 500 人，總兵力 4,750 人。詳見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軍事史·第三卷·兵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10 月），頁 489-492。

註十四：毛思誠，《民國 15 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 2（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 25 年 10 月初版，60 年 10 月重印），頁 667。

註十五：毛思誠，《民國 15 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卷 2，頁 684。

註十六：孟伏岳列夫著，王中、周祉元合譯，《蘇俄在華軍事顧問回憶 ．北伐前後的中國革命情勢（第九部）》（台北，國防部情報局，民國 69 年 2 月）。及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一部：建校建軍與東征北伐》（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2 年 1 月），頁 751-886。

註十七：劉鳳翰，《戰前的陸軍整編一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1 年 11 月），頁 27。

註十八：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召開編遣會議，準備從事部隊縮編。此一政策引起了地方軍人的疑忌，使形式內統的局面，維持不久再起 戰。國民政府先後對李宗仁、馮玉祥和唐生智等用兵，形成所謂「地方以武力對

抗中央，中央亦以武力對抗地方」的局面。詳見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台北，國史館，民國91年12月），頁19-55。

註十九：德國軍事顧問在華自民國16年起聘任至27年底撤退為止，期間對我國軍之制度改革、軍事教育訓練、國防設施均有重大助益，而在鐵道及郵政業務之改革亦有頗多貢獻。詳見 慶秋編，《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工作紀要》（台北，國防部史政局，民國59年10月）。

註二十：劉馥著，梅寅生譯，《中國現代化軍事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1年2月再版），頁164。

註二一：張力，《海軍艦隊發展史·緒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90年10月），頁12-23。

註二二：王國強，《中國兵工製造業發展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6年11月），頁85-102。

註二三：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一）》，（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2年1月），頁11-12。

註二四：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美軍事合作抗日紀要》，（台北，編者自印，民國74年9月），頁45。

註二五：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一）》，頁264。

註二六：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戰戰史》第100冊，（台北，編者自印，民國71年10月），頁1。

註二七：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4年9月），頁455。

註二八：國防部成立後，設有本部、參謀本部及陸、海、空軍及聯勤四個總司令部；首任國防部長為白崇禧、參謀總長為陳誠。詳見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一）》，（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2年1月），頁11-12、108-116。

註二九：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台灣東華書局，民國90年10月增訂9版），頁552-569。

註三十：朱瑞月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一）》，頁17。

註三一：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576-577。

註三二：張淑雅，〈美國對台政策轉變的考察：1950年12月—1951年5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民國79年6月，頁71-477。

註三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美軍在華工作紀實·顧問團之部》，（臺北：編者自印，民國70年），頁108。

註三四：莊榮輝，〈美國學者對中美關係發展（1049-1958）的看法〉，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9年6月，頁143。

註三五： 昆財，〈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華主張之分析（1947-1950）〉，國立中正大學 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90年11月，頁153-182。

註三六：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美軍在華工作紀實·顧問團之部》，頁0-13，張淑雅，〈韓戰期間美國對台軍援政策初探〉，《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2冊，頁476。

註三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美軍在華工作紀實·顧問團之部》，頁6-7。

註三八：政府遷台後，我國戰略構想屢有改變，民國68年中美斷交之前基本為「確保台灣、反攻大陸」，之後修正為「攻守一體」。民國83年修正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民國89年修正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並強調預防戰爭之概念。

註三九：國防部，《中華民國89年國防報告書》（台北，編者自印，民國89年8月），頁185-187。

註四十：國防部，《中華民國91年國防報告書》（台北，編者自印，民國91年7月），頁243-244。

註四一：國防部，《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國防委員會會議國防業務報告》，民國92年10月8日，頁7。

註四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實業計畫（物質建設）錄〉，收於《國父全集》，第冊，頁507。

註四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國父全集·民權主義·第一講》，第1冊，頁507。

註四四：國防部，《中華民國91年國防報告書》（台北，編者自印，民國91年7月），頁117-122。

註四五：蔣永芳、張元、余忠勇譯，《邁向21世紀的軍備管至》，（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89年6月）。

註四六：英阿福克蘭群島戰役，支援英國海軍遂行協力作戰的船隻約有50艘，超過參戰的軍艦數量；用改裝後之用途與功能分別擔任運兵艦、突擊艦、油輪、修理艦、飛機渡船、補給艦、雜勤艦、掃雷艦、拖船、醫療艦等任務。其中，最著名的船隻有44萬807噸的坎培拉號及67萬140噸郵輪伊莉莎白二世皇后號。詳見Captain Roger Villar 著、奚明遠譯，《英國商船參加福克蘭群島戰爭的經驗》（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7年6月），頁1-166。

註四七：國防部，《中華民國91年國防報告書》，頁251-257。

註四八：「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之相關配套19項法案，已於91年底陸續完成訂定，然有關軍用機場噪音、飛鳥管制等辦法之制訂，仍有待努力。

註四九：故市場調股份有限公司，《92年度全民國防理念之認知調報告》（台北，國防部，民國92年12月），頁218-219。

註五十：Murray Davies, Commanding Change War Winning Strategies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CT: Praeger, 2001, pp.421-45.

註五一：「軍事革命」的最明顯特色，就是徹底改變戰爭的結構。其形成的具體 涵，包括了十七世紀民族國家的興起、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核武的問世，這五項巨變重塑了社會、國家與軍事組織，進而改變了各國發展及軍力投射的能力。錯過早期軍事革命的國家，並無法藉由吸收西方技術的皮相，就輕易的大幅提升軍事實力。例如，石油雖然為伊拉克前海珊政權帶來大量俄製、法製或美製的硬體裝備，但硬體本身並不代表軍隊的作戰成效。伊軍人員非成長於現代化的國家之中，伊國也缺乏法國大革命以來所衍生的公眾政治的團結、彈性與技術深度。而在前述重大的巨變之間，尚有一連串較不具全面性的變革，這些次要的變革就是所謂的「軍事事務革命」。詳見Macgregor Knox, Williamson Murray, The Dynamics of Military Revolution, 1300-20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註五二：1951-1965 年之國防預算約佔國民生毛額的 9-11 之間。詳見 Neil H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J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York: Frederick A.Praeger, 1966, pp.118.

註五三：國防部，《中華民國 91 年國防報告書》，頁 104-105。

註五四：詳見 DavidS. Alberts, John J. Garstka, Richard E. Hayes, David A. Signori 著，楊永生譯，《理解資訊時代的作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2 年 12 月)。

註五五：我國 次朝代對 、募兵制都有不同的制度與看法，而其標準皆須視當時的情勢而定。然我國現階段之兵役制度究應何去何從，則需視現在(未來) 拊什麼樣的戰爭才能進一 就兵制、兵源及訓練等問題進行討論。同時，也需考量國家財力條件、社會文化及裝備獲得等情況。

註五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軍人精神教育〉(民國 10 年 12 月 10 日)錄收 於《國父全集》，第 2 冊，頁 478。

註五七：李雲漢主編，〈國軍失敗之原因及雪恥復國之急務〉，《蔣中正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第 1 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 83 年 11 月)，頁 1-8。

註五八：蔣中正認為軍人氣節及革命精神淪喪是大陸淪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以中山先生〈軍人精神教育〉，二文為核心，講演「軍人魂」、「革命魂」該講演成為當時之重要精神武裝指導。

註五九：國防部，《中華民國 91 年國防報告書》，頁 239-240。